

MEMOIRS OF LUXUN

手稿本



许广平 著
周海婴 主编

鲁迅回忆录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回忆录 / 许广平 .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03

ISBN 978 - 7 - 5354 - 4237 - 6

I . 鲁 ...

II . 许 ...

III . 鲁迅(1881 ~ 1936) - 回忆录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108 号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主 编: 周海婴

责任编辑: 安波舜 张 维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媒体运营: 赵 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 - 87679301 传真: 027 - 87679300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 11 楼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 58678881	传真: 010 - 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版次: 2010 年 0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0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0 千字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目 录

目 录 1

序：妈妈的心血 1

前言 3

一、从“五四”到“三一八” 5

二、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12

三、鲁迅的讲演与讲课 16

四、北京时期生活、读书 23

五、所谓兄弟 31

六、厦门和广州 37

七、我又一次当学生 44

八、同情妇女 49

九、内山完造先生 55

十、向往苏联 64

十一、瞿秋白与鲁迅 68

十二、党的一名小兵 75

十三、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 82

十四、与北新书局的关系 92

附录一： 97

附录二： 103

附录三： 104

附录四： 105

序：妈妈的心血

周海婴马新云

这本《鲁迅回忆录》母亲许广平写于五十年前的 1959 年 8 月，11 月底完成，虽然不足十万字，但对于当时已六十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阻。文章完成后，起初在北京一本期刊《新观察》上连载，1961 年 5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二万一千册，当年 9 月第二次印刷，数目不详。此书出版在当时影响可谓不小。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今天我们把五十年前许广平的手稿复原，也是想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思路和史实。其中她发自内心生前一直不断挂在口边的朴实“报恩”思想，也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后代。王元化先生在 2007 年 5 月说过，大意是这些作品是作为历史事实摆在那儿的，而展现历史则要尽量做到完整。作为历史原貌收录进来，是为以后的文学研究者留给他们方便。

然而，眼下有些学者，对于鲁、许在那种历史时代的生活，如“兄弟不和”、“重婚”……似乎进行了“公允”的分析、质疑。我们对这样的“剖析”文章不予回应的原因是：他们脱离了那个时代、历史、环境、对象、感情、功利，单方面地用简单的加减法，去解“数学多元方程式”。那些结论可叹地并不符合历史的“正解”。这些，读者可以从文字里感觉到共鸣。奉劝这些文人，再多些披览，再多些客观，不急于匆匆发布“高见”。

目前这部手稿保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了使阅读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的读者方便，我们加以很少的注解，以帮助大家减轻寻找相关书籍及资料的比照时间，也便于分析历史的轨迹。

一、注释中的《回忆录》一书均指 1961 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

二、注释中的《正误》一书，均指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朱正先生所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此书对 1961 年版的《鲁迅回忆录》提出十四处正误，这十四处与手稿本完全相关或有些相关的十处，我们予以了注释，其余四个无关之处不在此赘述。

三、海婴个人存有一册《鲁迅回忆录》的初版本，其中夹有两页《鲁迅回忆录勘误表》，另有两页许广平所作“小小的更正”，均为蓝色钢笔件，是时任秘书王永昌先生的手迹。在出版这册手稿本中我们都据此进行了更正。

四、在手稿中，常常出现一些标记，如“？”或“ ”，反映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一些斟酌未定的，我们均作了相应标注。

五、括号里的注释除标明是作者所作外，其余为编者作注。

六、手稿旁白处留有一些人的意见，对此都进行了标注，以反映作品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下产生的。至于何许人意见，稿纸上没有注出，编者也不敢猜测。

七、我们为了能真实地反映接近作者写作时的心理情境，对于手稿中大段删除的文字给予了恢复，并加了标注，使研究者了解作者的思维活动，并满足读者了解历史情景的需要。

八、这本半世纪前的手稿，年代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是否值得披露于世，曾经有过犹疑。受到几位朋友的推动以及母亲生前说过“她的文稿无可隐秘”，因而决定以史料形式刊出。

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得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于静先生帮助。她在装修房屋的间隙里，查阅了资料，辨识、抄录原稿，还做了加注。她办事认真、勤勉，是难得的做学问者。我还要感谢刘思源先生，他参与确定体例及往来联络，最后还帮助校阅了全稿。

此书的装帧、版面、插图一应出版工作，是长江文艺出版社，让我们看到这本精美的图书，在此一并感谢。

于 2009 年 7 月 1 日党的生日

前言

*手稿原有而后删的内容使我们能够略知当时作者的写作背景。《回忆录》添加了批判冯雪峰的文字。

许多朋友鼓励我写些回忆之类的东西。有些借参考书给我看；有些要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加以选择和安排；还有些叫我先写个大纲，再加以叙说；更有人提出照我以前写过的《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那两本小书的内容加以扩充。凡这些，都使我感动于对文化事业的关怀而鞭策自己。同时，又因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先在城外找个地方安静下来。

从7月13日—8月13日的一个月期间，用在阅读鲁迅的日记、著作等方面，旁及一些有关鲁迅著作的言论，另外还看了些世界名人的回忆。很快地书未看完就过去了一个月，再拖下去怎么得了？就是这点不成熟的准备也写作，尽行工作罢，不能再拖了。写作开始于8月半起动笔，到9月20日就又停止工作了，回到城内参加些社会活动，这就是每个人都欢欣鼓舞想把自己投入一份去的国庆前后的许多工作。到10月底才又抽身回到城外，静下来，花了些准备工作的时间，又继续进行写了。到11月底，初稿算全部写完，共十三节。（注：第十四章未发表）自己从头一看：时代虽大致略有先后之分，但有些事情带连锁性的，就须一次写完在一个节目里，所以其实也分得不太清楚的。（又，他们的许多建议中，我采取了和我一起工作的王永昌同志交谈方式，在散步中谈谈鲁迅生平事迹，引起回忆，再从谈话中整理出几项要目。）这就是现在所写的，但这还是不够得很的。

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注：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除）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注：手稿此处原有“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后又删除）就只恨自己限于能力，未能多所体会而写出来的还是自觉离满意还甚远。原因是自己一方面体力不够，初时进度太快，每日可四、五千字，本打算“十一”前完稿的，但血压马上升到240度，头昏脑胀，这样将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不得已乃变更办法，拖长下来，所以到十一月底才完工。其间实际执笔，

不过两个多月。以如此严肃的工作，而我只做到“快、省”二字，离“多、好”实远甚了。幸而重温了一个多月的书，稍稍引起回忆，动笔起来，极力去芜存精。对年代时日，又多借重于原来著作，但仍难免挂一漏万之讥或拾了芝麻忘了西瓜之叹。那是因自己原本不善写作，文艺性又很不够，写起来平铺直叙，历史事实也难于做到波澜壮阔。可能看起来未能满足读者希望的。

又，本书没有大段的对鲁迅说话的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了。自然，朋友们来，也有些材料，但我又尽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于总是些家庭琐碎，失却主题意义。因为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因是历史事实，不能马虎出之，所以一些比较找不到引证，就是有些记得，也从略了。而友人接洽的有关左联之类的事项，则以遵守铁的纪律，我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不过从我看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严肃的。对党的关怀热爱，是推崇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当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就是对左联工作，他也不是独自擅尊的，处处请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议，再听从党作最后决定。即接见外国记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见面。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为党的工作多添些人手来。因为极望人多，他就对青年的培植爱护的热诚过重，有时难免选择方面疏忽了些。致使希望有为的转而成为失望的也往往有之了。（注：手稿此处原有一句“但鲁迅虽或有时有被蒙蔽、被包围之嫌”，并在左旁白处标有一“？”后悉数删除）然终不失其坚决自觉。在大关节处，他始终是遵循着党的方针、路线行事的。这是鲁迅的优点，也就是笔者所见于鲁迅的最重要的回忆！其他如对文学遗产问题，对文学改革问题等等和许多有关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的杂文问题，读者可从鲁迅著作找寻，我在此就从略了。（注：《回忆录》在此段中加入若干批判冯雪峰的文字）

回想鲁迅的写作，从不马虎从事，处处为了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好处而着笔的。即一人一事，他也如此。比如他曾经说过要出一本名《五讲三嘘集》的书，而且也曾对我说：这书名正好和《南腔北调集》作一联对；和《伪自由书》之对《准风月谈》，《三闲》之对《二心》，《朝花夕拾》之对《故事新编》，《呐喊》之对《彷徨》一样的工整巧合的。然而这《五讲三嘘》的“三嘘”实在觉得写了未必于社会、人民有何影响而终于放手了罢。（注：《正误》认为，许广平所说《五讲三嘘集》未出的原因与“事实不符”，事实一是“北平五讲”整理工作量太大，二是鲁迅认为对“上海三嘘”所要开罪的三个文人，以“无言的轻蔑”为好，见159页）似这等审慎，则我对于他的生平，尤其后十年在上海的一切，实在写得很潦草不够了，对鲁迅严肃写作的态度也差得远了。

幸而时代已不同了，今天已不是个人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忠实的小学生，总会走向较小的错误的。

我于是以此献于纪念“十一”和读者之前。

1959年11月24日写完

一、从“五四”到“三一八”

*《回忆录》与手稿在本章中有很大的不同，近乎重写，具体表现在，一：章名重命，《回忆录》第一章命名为《“五四”前后》，将此章调整为交待鲁迅时代的历史背景与个人背景。二、结构内容进行了很大调整。《回忆录》将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放在第一章，将北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相关内容调整到了第二章；《回忆录》将鲁迅在北京时期的生活、活动的相关内容调整到了第四章《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或第五章《周氏兄弟》。三、第一章中鲁迅与党的关系和批判胡风的内容，《回忆录》均未采用。四、《回忆录》在文章的条理性、思想性、理论性等方面进行了大的修改与提高。

从一九二五年八月到一九二六年八月这一阶段，是中国革命普遍深入到各方面的大时代。在北京，有三一八惨案；在上海，有五卅惨案；在广州，有沙基惨案。可以说，从国内到国外都有关连的大事件，也是有良心的人民每个人都深深感觉到切肤之痛的救亡图存的一次紧迫工作。鲁迅在这一年经历了不平常的有生以来前所未感受到的内忧外患最严厉的考验。通过这一个考验，他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可救药的一面，（注：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标一“？”）如卖国政府、正人君子等等。但他也亲身投入了另一面的行列里，如反抗卖国政府、正人君子之流的，明的、暗的、软的、硬的、欺骗利诱的、卑鄙可耻的勾当。这当口，软弱的虫豸似的，一些羊样的凶兽或凶兽样的羊的人们，眼看一个个的倒下去了，（注：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标一“？”）惟独鲁迅和他同样见解的不甘屈服的人们、青年们，在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领导着中国人民组成一条看不见边际的无量广阔的洪流，奔向前去。

1926 前后年轻时代的许广平

作为一个学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女青年，我幸得厕身其间，看到鲁迅怎样以大无畏的精神，蓬勃不可一世的气概，投身于大运动的行列里，鼓舞着大众，指明出路标，使每个真的勇士，更加勇猛直前。

阻力是有的。首先，知识分子中的卖身投靠者们就加以诽议说“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来攻击爱国不甘箴默的、起来打破窗子突围冲击的人们。以鲁迅为代言人，向他们斥辩。指出“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见《华盖集

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这些把国家大事、群众得失看作“闲事”的先生们，其实就不能算是人，因为他们既把群众的事，看作等闲视之，也就把这“事”置身事外，脱离群众要求，而为反动统治阶级帮闲服务了。这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两个月的气候，一批反动的知识分子的心声的暴露。杀机早已萌芽，而为后来杀人者预留余地的一种姿态。

“你们做事不要碰壁”，这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的压迫学生的杨蔭榆派教员向学生群众的警告，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把戏：“自投罗网”、“自行失足落水”的一种杀了人还不认账，美其名曰“自愿”、“自碰”的鬼把戏。我直截了当地答复他们“杨先生就是壁！”即压迫者预置的一堵墙，不许他人逾越，你如果往前迈进了一步，就是“碰壁”，就该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我们要生存、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见《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当时的青年运动，当时的爱国救亡运动，凡我们认为人的行为，认为人类所当为的，都被反动阶级看作闲事一桩，无关紧要。再要反抗，便是自寻绝路。也就是“壁”已树立，你们寸步难移，不许乱动了。

这时鲁迅的回答是“我还不能带住！”教导学生要“壕堑战”；要不作无益牺牲；要“准备‘钻网’的法子”；“如果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倘使敌人“‘用阴谋’与‘装死’”来对付，事情是僵持下去，拖下去不容易解决了，则“已没有中庸之法”。在这里，鲁迅启示给青年的战术是：“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待。”（见两地书）这个教育，这个指示，非但平时反抗用得着，就是战时军事上也运用得着，暗暗符合于解放战争的获得胜利，有名的坑道战运用到朝鲜前线也使敌人胆寒力竭，俯首就范。这不是说，鲁迅会那么预见，能料到解放战与反侵略战的种种成因后果，对付方法。而是一切压迫者被压迫者从你死我活中得出的经验，战斗可操胜券的不易的真理。

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虽然那时党没有明确给予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

他叫青年“少看中国书……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见《青年必读书》）。

胡乱行动也不妥当，就要懂得什么是可行、应行的。于是他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见《通信①》）

他自己也承认：“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见《通信①》）

但读者也不要忘记了时代，拿我们现在的目光、的环境来设想，问鲁迅当时为什么就不直接参加党的活动？党的活动，包括工农兵大众，以及其他一切群众。

鲁迅做思想工作，专门向知识分子以及他周围的群众说话，是整个与局部的不同，而局部有时也影响到整个的局面。鲁迅长期以来是这样做了。用他那匕首、投枪，向周围黑暗势力——他所最熟知的——冲锋陷阵。首先解除人们的顾虑，要“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见《忽然想到 [五至六]》）

胡风之流的反动和歪曲，借鲁迅的话达到他蒙蔽青年的目的，就是把 1925 年的时代，搬到解放之后了。那就变成了违反时代，远离事实，借鲁迅之名行反动之实。

还是这一年五月的杂感上，鲁迅以无比的热爱，爱现在，“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要以“勇者愤怒”的心情，向不合理的社会奋斗，要再接再厉的行动，向旧社会作不容情的斗争。如果是真的爱“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见《华盖集》）

在《北京通信》里，他答复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时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又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这个道理，到现在还是需要的。我们党领导大家，号召增产节约，不是叫人们不要丝毫的有意或无意的浪费？有意义地，也就是除自己活了，还是想到大家要活，世界上人都要合理地活下去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心怀，多么热爱着人间世？

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黑暗的现实。但对于手无寸铁的青年遭到迫压的时候，是如何伤痛了他的心。他屡次召告青年不要去请愿。现实的残酷性就是一个学校，如女师大，叫做当时的最高学府了，也还遭到堂堂的教育部长章士钊下令其司长刘百昭引领警察及打手和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学生出校，禁闭在补习学校空屋中的事件。记得这时我也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享受共同的命运。但眼看着同学们像货物一样被拖走，像罪犯一样挨打，痛哭失声的惨无人道的这一幕活剧之后，我就离开了学校，随即跑向北大学生会告急。连夜开紧急会议，向各界呼吁。待到伪官方在囚禁的人们中查点人数找不着我的消息在报纸上登出，鲁迅对于一时得不着信息的我们几个人是如何焦躁，如何派亲信向各方寻找。至于章（士钊）杨（蔭榆）则不顾青年学生远道求学，离乡背井的困难的。他们惟恐拔不去眼中钉，惟恐“啸聚学校”（他们的话），不易达到他们解散目的，正在设法叫两个警察押一个，押解被开除学生六人回籍。试想想，这六个学生，为了学校之事，却要活演“林冲刺配沧州”的一幕，这倒行逆施能不叫天下英雄气愤！学生们就在补习学校悲愤填膺的时候，在校外奔走活动的几个人，这时就走投无路。平日过从很密的亲友，有些也怕惹事拒绝招待了。这时鲁迅就担当起来，说：“来我这里不怕！”如是我就在现今故居的南屋，和老同学许羨苏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事后听到：有几个警察也来过西三条胡同，被鲁迅先生挡走了，这搜捕是多么周密呀！

革命最快收效的是火与剑。要有党，这鲁迅是知道的。而他最丰富具备的是热情，是革命文学者的热情。我们只要翻开《回忆高尔基》那本书，就知道一个

革命文学家的高尔基对人是多么热情，对朋友们诉说的生活艰苦是多么爱洒一掬同情之泪，就像孩子一样地时常眼泪盈眶。鲁迅虽然比较能克制些，但常常因为焦虑得不到青年们的近况而使得他烦恼不安的情形，我是每每也为之不安的。更其读到他《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哀悼文字，真是一字一泪，用血和泪写出心坎里的哀痛，人间至情的文字。这流露于作者和读者的同声一哭，正是不甘屈服起而抗争奋斗的呼声。是唤起“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知道死尸的沉重”急起奋斗的宣言。

对于请愿的事，列宁敬爱的哥哥亚历山大做大学生时，曾经和同学们在沙皇的时代做过；后来因参加谋刺沙皇而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注：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标一“？”）“这个不幸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受到了锻炼，使他更加认真地去思考革命所应该走的道路。”（见《亲属忆列宁》）所以列宁主义的党是不选择这条道路的。鲁迅对暗杀的事是不赞成的（见《两地书》）。请愿的事，也“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因为“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这是《华盖集》《空谈》中，鲁迅一系列沉痛的抗议中继《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纪念刘和珍君》而说的。但我们照例还是不断地请愿、请愿。我还忆起“三一八”那天的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我知道他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让我送去。放下了抄稿，我就连忙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就讽刺地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显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我只得在鲁迅故居的南屋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府前关起两边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第二天，（注：据勘误表改“不多时”为“第二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斗士刘和珍和杨德群活生生地被打成僵硬的尸体了，真是人间何世？

鲁迅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了如下的几个不寻常的字：“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见《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这是向压迫者反抗的最有力的宣言。

然而，丧心病狂的论客们，却想用血来替主人洗涤，吐出跟着主人摇尾乞怜的狗嘴的话说：“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无怪鲁迅掷给他们以这样的厌恶词句：“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见《死地》）

在悼念刘和珍君的时候，鲁迅复以激昂慷慨的陈词，号召青年、革命者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见《纪念刘和珍君》）果然继“三一八”之后有“一二九”运动，有党所领导获至彻底胜利的抗日战争和反抗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注：以上有关“三一八”惨案的内容在《回忆录》中均移至第二章）

这时的鲁迅在现实面前，已不是袁世凯称帝、（注：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标一“？”）张勋复辟时期的自感于个人力量微弱，莫谈国事的空气下，作三箴其口的消极态度，躲在一角抄抄古碑，写写字，钻到钻研碑帖方面上去了。我们并不否认，鲁迅在整理旧文学上，从碑帖、拓本、汉魏六朝墓志、石刻等里面可以发掘出许多有用的东西，为研究中国字体的变迁的，久久欲执笔的《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为整理中国唐宋以来的文化、社会风俗习惯、生活进展，从这方面另辟途径是费了他积年累月的不少心血的。这心血一直没有着落，以后终他的一生也对碑帖等再没有机会

下手，至今对于这项研究工作可说还留空白，自是可惜。但有更急迫的需要，这早已被《新青年》时代取而代之的了，就是他不再沉浸于抄古碑而代以写《阿Q正传》……等等即是。但也不要忽略了，鲁迅晚年在上海，当白色恐怖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他又想起了那久蓄心中的工作，也还是断续地向河南等地托人找寻资料，来完成他计划已久而未实现的心愿：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

就从这一时期起，鲁迅的生活变了，他的人生观变了。由于参加到群众斗争中去，他在群众中生长，更加坚定，结束了独自彷徨的荷载者而参与到人海的潮流，以至走到广东大革命的时代里，又由广东到上海，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左联和各种革命工作，作为时代中的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兵而出现。

这个时代的关系，在鲁迅来说，是一条红线贯穿到他的末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为止的一个时代。

自然，这条红线在鲁迅来说，也只不过是為了便于说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而划分的，至少是在我这一方面就自己所能了解，体会到的来说。当然，广义的说，则鲁迅的从医学转到文学上来，就早已萌蘖着他的一贯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运动。五四以后的以李大钊先烈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等等，都是中国人民急迫需要的药。

时局的推移愈甚，人民的四处寻求偏方、验方、灵方、圣药愈益迫切，就希望有那么一种药到病除的经验良方，可以行之有效的，即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鲁迅坚决不移的跟着看到将来，看到必然胜利，看到这一胜利的将来是属于我们的而益加鼓足干劲，毫不休止地工作着。

但空间是有一定的，这时期丢开了搜集石刻而代以崭新的内容，就在一九二五年从鲁迅的思想领域上看到他所读的书有：《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注：据勘误表《露西亚文学之理想与现实》一书删去）《革命与文学》等书籍的出现。和一九二六年还未出北京时看到的《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以及冠以露西亚、新俄等字的书，与线装本的中国书籍占着同一个地位。（参看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日记的书账）这和未名社的出版：《苏俄文艺论战》、《烟袋》、《四十一》等书，介绍新思潮的同一时期。正如鲁迅向人们说的：寻求‘新生力量’而以苏联的成就为我们学习的榜

样。可以说已逐渐从向往走向初步认识了吧。希望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报纸杂志，也逐渐热闹起来了。诚如鲁迅自己说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写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见 1925 年 3 月 31 日致许广平信）

鲁迅用空论来发牢骚，自己感觉到“不外乎”的自叹没有什么作为，但敌人的计算却是锱铢必较，莫须有，还是要嫁罪于人的，怎肯轻易放过！钻网的办法是逃亡。这逃亡就连带着一系列的，人们所熟知的失业、不安定、带来心境恶劣，从八道湾被逐出后大病一场，到砖塔胡同住又不断病中觅新居。新旧病魔缠扰加之一九二五年大衍发微中的赫赫名单，虽公开有人否认，事实最能打这些人的嘴巴，就是邵飘萍一露头就遭到毒手，不由你不相信。鲁迅于是继着逃亡之后，病又起来了。

鲁迅自以为身体是健康的（其实不然），从不加以照顾。他有几种随身法宝的药：阿思匹林、海儿普、奎宁片，无论什么病都先用它，轻泻、退热、抵抗力强的时候过几天就好了；抵抗力一弱，事情积累一多，休息也不见好的时候就不行了，要请医生诊治。他长期患着牙痛、发热、肠胃病。那时医治也简单，从未看见他检查过肠胃病的严重状况，但胃痉挛起来却像硬石块一样抽搐，病不可当。大约至多每隔三两个月或者更短些日子，不是牙病就是胃病或疲劳就头痛发热，却一样的工作、授课，有时算是休息在家了，还是不断地接待客人，装订旧书，抄写什么的没有个休息。你说他不晓得病了需要治疗、休养吗？他懂得的。老朋友们都记得：1917 年 5 月周作人患了瘡子（疹子）病，他是怎样急于四处找医生，急于自己请假陪伴看护病人。又当 1921 年 6 月周作人患肋膜炎在西山碧云寺静养一年，他日夕需要佛书披览，鲁迅就三天两日地奔走于城乡之间，仆仆于佛书的输送。劳累之余，自己也患项痛，鲁迅在半路上就大醉一场，也大病过一阵，过不几天又照样地为之奔走了，真像铁打似的。不但这样，回来还要译稿，还要卖稿换钱给西山疗养的病人设法，这就是鲁迅为人服务的态度，似乎从不知道自己也不时生病需要治理的精神。据医生诊断，他也生过肋膜炎，但没有休养，亦未发觉治疗，就对付过去了，其实是拖过去了。在“三一八”后的大病一场，仅仅是各种积劳成疾病况下看到的一个总爆发罢了。

那时医生给以警告：说是不能吸烟、饮酒，否则药力无效。母亲在焦急，家人不敢劝阻，尤其难禁止的是烟。鲁迅自己则竟连日不食少睡。在战斗的环境下首先是保存实力，如果连这躯壳也不存在了，那心灵还有何依托可言？那战斗也就首先向敌人示弱了。我们焦躁不安，向鲁迅进言，以保卫鲁迅的健康毅然肩负起来。（注：以上鲁迅病况的叙述在《回忆录》中均移至第四章《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

这是对革命的爱。对同志的休戚相共的关怀，人类最崇高的，不知其他的对别人的爱！就在这一种爱的保卫下得到了苏生。鲁迅多少克制住自己的烟和酒，

尽量服用些有益于身体的营养物。允许“少住些时”的多留些精力来做第二次的战斗。我们从他在厦门大学时期的尽量调养身体，争取睡眠休息得到充足，就可见他积极地为养精蓄锐作好准备条件，以为下一步战斗得到更好的效果而服务。

二、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回忆录》将手稿中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的内容进行了整合，相关内容均移至本章，增强了文章的条理性。

女师大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有关情节，读者倘一翻阅《华盖集》的正续编，对于当时人物，如杨蔭榆、陈西滢、章士钊之流，事件如风潮真相，大底可以了然于大概。他们内有校长的高压，外有正人君子者流的舆论、报刊和流言，上有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北洋军阀的段执政，布下天罗地网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众。鲁迅就是站在学生群众的一边，义正辞严地给予这批羊样的凶兽们以无情的打击，在两本《华盖集》中占了四分之三是用来攻击他们的。最后他们相率在正义之前失败了，在真理面前缴械了，他们要求“带住”了，鲁迅说：《我还不能‘带住’》，这些文章，读起来至今还虎虎有生气，令人浮一大白。有读了古人文章而医好头痛病的，这些攻击章、杨等文仿佛似之。

鲁迅在这次打一漂亮的胜仗，敌人披靡，弃甲曳兵而走，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注：据勘误表改“至今在历史上还翻不过身来”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原因何在？一个女学校的风潮事件实很普通，何至闹出若大问题，牵连许多人物？假使这边没有一个鲁迅这支笔，是否就会战败？我们试探讨一下！

最后胜利永远属于革命的一方，反革命者就是目前稍占些便宜，最后终于失败，这是铁的纪律，谁也不能推翻。鲁迅跟着革命的群众一起前进了，获至胜利了。反革命的积聚一批反动力量，看似有权有势，炙手可热，到头还是失败了，这是不可转变的规律。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已临末日的段祺瑞执政，想和革命的民主主义孙中山作斗争，想和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的千千万万青年、群众以及一切人们对抗，是无济于事的。女师大事件，就是这一个具体事例的最好说明。

学生们其始不过想对自己的学业有所提高，对学校措施有些不满，倘使接受这些正确意见的要求，风潮本可避免。但既属于反动的一面，他就有逃不出反动的手法、的规律、的一套办法：嗾使貌作旁观、置身事外，其实是一伙人的一批在外大说“闲话”，如陈西滢，大放流言；如现代评论派，又颠倒黑白；如《甲寅》周刊与老虎总长章士钊；因而引起公愤，向恶势力表示毫不低头，加以鲁迅随时在旁看出缺点，立即加以驳斥，不使敌人野心得逞，如是而已。

杨蔭榆不学无术，到美国镀金回来，拉拢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活动了几个拥护女人长校不问贤愚的狭隘的唯女权论者；再投靠了当时权贵段、章，利用了歪曲事实、无耻造谣的陈西滢，就以为炙手可热，人莫敢违了。于是蔑视教师、

学生、群众，与人民为敌了。

人民在反抗杨蔭榆的卑鄙治校的风潮起来不久，正值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在3月间逝世，人们痛悼之下，突遭杨蔭榆污蔑中山先生是“共产共妻”，不许学生去追悼而大愤。后来借纪念“五月七日”日本军阀强迫中国反动政府签定“二十一条”的一天，杨蔭榆利用人民爱国热情，必然踊跃参加大会的机会，而把久已被被学生驱逐出校的耻辱，想借国耻而替她洗涤，回校办事，若有违抗，即以捣乱国耻纪念的罪名，施行其险毒阴私的目的。于是着令其私党历史教员（在教育部供职的），要刘和珍和我向杨认错，否则开除学生亦所不惜。我们秉全体同学之命，个人没有错，故决不能认错，倘一认错，则全盘皆输，敌计得逞，万万不可。这个毒计未能使坚持正义的学生屈服，于是杨蔭榆躲在校外写出开除六个学生的布告，在清晨挂在墙上，被大众看见，愤不可遏。学生会马上决定不承认这个非法开除，就把这布告牌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地板内任它无期打入冷宫。杨蔭榆四处搜索无着，无法再发布告，我们照样上课。

上海五卅惨案事起，学生们声援支持了上海工人的斗争，女学生们（我们）立刻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但杨蔭榆诡计多端，一面扬言学校暑假大修理，大家不准住校，一面向学生请来讲习护士知识的医生进言，婉言劝阻来校，这样学生更加愤慨她的阴谋毒计。连离家万里，一时不易回去的各地学生，因杨欲借题发挥，借学校修理而迫令开除了和未开除的学生一同离开学校的毒计不令达到，就把真相揭露出来。杨蔭榆恶毒之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把学校电火断绝，伙房关闭，大门用铁链锁起来，杜绝来往！到了夜里，借烛光维持走动，学生们饿着肚子隔门与各界、亲人、慰问者相对饮泣，而“正人君子们”的流言，使杨有可利用，说“以免男女学生混杂”，欲借封锁以维持并未亲眼目睹的封建；实亦可笑可叹，毫无根据之至的行动。学生们对此感觉鄙夷其阴险，于是我执行学生会总干事的职责，在大门内宣言：像这样关闭电门，迫令燃点蜡烛，倘有失火，无处逃命，为自卫计，大众毁锁开门！命令一声，众人奋起，不一时锁毁门开，亲友执手互庆得以相见了。为避免奸人造谣，学生们请了几位师长住教务处，和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这紧张的一夜鲁迅也是来校执行任务之一人，我们就这样把杨蔭榆的鬼计，一件件揭破了。（注：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有某人意见“加刘百昭”）

手无寸铁的学生何所恃？理直气壮博得直正的舆论，各校学生会和我们一起，支持我们最力的北大学生会更是他们嫉恨的，所以造流言。但我们无所惧怕，因同学中有参加了共产党的，如刘亚雄等人，通过她们，得到党的指示，有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可以遵循，我们不怕再接再厉而不继！还有真正执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也支援了我们，这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反动，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爱国者与卖国者的斗争，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斗争。所以步伐越来越众，人越来越多起来，鲁迅是用笔来支持了我们。

也有国民党中的短视者，我和刘和珍去请教他，他鼓动我们说：“你们干，放胆的干好了，你们看黄花岗有没有你们！”我当即想：原来闹革命就为的要在

黄花岗争一席之地？这位先生我就从此不去领教了。

鲁迅在青年、在学生中威望甚高，原因是不自私。在学校风潮起来时，他作为一个讲师，没有很多时间在校，本取漠然态度，但因许寿裳先生曾当过前任校长，还有理科主任也是许先生熟识的，正是被杨骂过“岂有此理”的无理话的。鲁迅可能对校事也听到了一些，后来学生被开除了，“正人君子们”又大放流言，把女学生糟蹋得不成样子，章士钊又据流言写成文章刊出，杨蔭榆又据之发“感言”，这世上仿佛一团漆黑围攻着青年学生，这才引起鲁迅的注意，替学生拟过两个呈文到教育部，催促赶快另换校长。又感觉污蔑女生太甚，教员应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于是亲自拟好稿子《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到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和他等人共同联名发出，证明学生被无辜开除和学业品性“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用挺起胸脯、负责的态度以驳倒那些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说人话的“闲话之徒”。而这些“闲话家”们，正是杨蔭榆有关的人物，为维护自己派、系、籍的关系，蝇营狗苟地干着污蔑别人的勾当，鲁迅就义正辞严地公开驳斥并直接坦白自己“我的‘籍’和‘系’”。这种大无畏的对付敌人是前无古人的战略方法，惟有在后来，在党领导下解放战争中的人民解放军才能看到这种精神。

他们自己如此卑劣，却想把这卑劣的行为嫁罪他人，以期封住对方的口，不敢再说什么话。鲁迅是不买这笔账的，所以在几位《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的具名上，鲁迅起草时就自己写明“国文系教员”，其他签名的人也表明了自己的“系”，结果除了“史学系主任李泰棻”之外，其余六位就都是“国文系教员”，并且都是“某籍”，这就对陈西滢给了一个不轻的回敬。其实只要问事情办得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其“籍”和“系”本没有什么相干的，惟其自己们结党营私，首先就把私心诬加给别人，和流氓自己做了坏事也说别人一样做过的，同样鄙陋行径。

这办法章士钊也一样运用起来，女师大风潮迟迟不予处理，不予解决校长问题。他利用杨蔭榆恋栈之心，死硬到底，一面支持她压迫学生，一面暗中布置要他夫人吴弱男来做校长，所以解散女师大如此积极，实想打扫好“臭毛厕”为夫人登坑也。但他倒先行试探，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因鲁迅站在青年一边），将来给你做校长。鲁迅何等样人，岂为图做校长而闹事的。鲁迅不予理会，于是他就越权撤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以泄愤，揭开章士钊处理女师大风潮的事件，就是如此见不得人的。

后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的一个学校的事件了，牵涉到北大。因为女师大的国文系，也就是我选课的一系，六位教员都是在国文系任教的，也都是在北大任教的，更是素来多是反对胡适的。北大自蔡元培先生辞职之后，兼收并蓄的风气逐渐消灭了，成为独家天下，要能在北大不被排挤，就得向这些人低头，尤其向胡适派低头！所以他们的骂鲁迅，内幕在此。更揭开些来讲，女师大风潮，也是亲英美留学生派，向人民揭起反叛的序幕。从章士钊、杨蔭榆、陈西滢等等到胡适的孤群狗党，查一查他们的学历，就不河汉斯言。